

文壇五十年

曹聚仁著

續編

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印行

文壇五十年

(續編)

曹聚仁

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印行

文壇五十年（續編）

著作者：曹聚仁

出版者：新文化出版社
香港大角咀道139號三樓

承印者：正華印刷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400號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售

[No. 2205]

目次

一	革命的浪花·····	一〇三
二	「學衡」與後「甲寅」·····	一一〇
三	魯迅在上海·····	一二七
四	話劇之成長·····	一二四
五	新詩的進步·····	一三〇
六	寫實主義的小說（上）·····	一三七
七	寫實主義的小說（下）·····	一四七
八	言志派的興起·····	一五五
九	「人間世」與「太白」「芒種」·····	一六五
一〇	「大眾語」運動·····	一七二
一一	報告文學·····	一七九
一二	戲劇的新階段·····	一八六
一三	戰爭來了·····	一九九
一四	戰場上的文學·····	三〇八

一五	抗戰與詩歌·····	三一四
一六	幾個詩人與作品·····	三二一
一七	離亂中的小說·····	三二九
一八	抗戰戲劇與新歌劇（上）·····	三三九
一九	抗戰戲劇與新歌劇（下）·····	三四七
二〇	小品散文的新氣息·····	三五七
二一	文藝批評之新光·····	三六三
二二	史料述評·····	三七四
跋	·····	三八三

一 革命的浪花

筆者四圍的師友，都是五四運動前後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他們很多從事新聞工作或寫作生活的，卻也很多參加社會革命和政治鬭爭的。我們在三十年後，回看這一段歷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跡，有着文學革命的痕跡，也有着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跡；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而薈集在政治社會革命這一主要潮流上。因此，新文學運動的紀程碑，也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的政治運動有了關連。許多新文學作者，如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邵力子，都曾投入這一場北伐的軍事行程。因此我們談新文學運動的演進，對於一九二四——二七年間的社會政治動態，當作簡括的追溯。

近代中國的社會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滿漢的問題上；同盟會雖然標舉三民主義，大多數會員的思想，都集中在狹義的民族主義上面，恰與一般社會人士的傾向相合，所以得到顛覆滿清皇位的結果。辛亥革命成功後，一般社會的心理，以為共和的黃金時代到了，多數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樂業的和平。政黨所爭的是政權，論壇所討論的是總統制好呢？還是內閣制好？一院制好呢？還是兩院制好？簡單的說，就只是政制。此時候所受外來的壓迫，未嘗不厲害，然而大家尚沒有積極反抗的勇氣；民生的窮困未嘗不顯著，然而大家尚不覺得迫切；所感覺比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復活與否的問題。從民國元年到四五年，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說是在一種僵凍的狀態中；所有的政論和政

黨的政治活動，都與一般社會不生多少關係。到帝制運動興起時，才稍稍有人感覺到。到民國五年，帝制運動終了時，中國思想界從國內國外兩大刺激；國內的爲新青年派的新文化運動，國外的爲世界大戰的結束，與蘇聯革命的成功，這就是上文所說五四運動前後的社會動態。

把握這一社會運動，吸收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青年，成爲革命幹部的，就有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個政團（國家主義派即後來的青年黨，和由研究系演變而來的民主社會黨，也吸收了一部份知識青年）。一九一九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到了第二年，勞工協會祕書部成立，這便是中共的雛形。到了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正式成立，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這就開始他們的社會革命了。國民黨本身，經過了民初迭次革命的失敗，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間，軍政府失敗以後，離開了廣州，暫時居滬；一面認識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想著書來改造國民的心理；一面想着手整理黨務。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合稱建國方略），都在此一時期中草成發表。不過，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這一段時期的國民黨，還只是老同志的國民黨，和一般國民不發生關係。到了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受了陳炯明的排除，又從廣州到了上海，這才開始黨的組織上的澈底改革。孫中山有「在革命時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的信念，並且認定黨的組織需要嚴密，黨員宜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他看見了蘇聯共產黨專政的成功，更加強自己的信念。到了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着手改組，十三年一月間，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容共」（國共合作）的政策，同時，着重宣傳，喚起一般民衆的政治認識；採取農工政策，揭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社會主義口號（詳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才進入國民革命的大時代了。

有一最重大的革命力量，便是一九二四年五月，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那位任校長的蔣介石，

從蘇聯參觀紅軍訓練方式及組織方法回來，他就把黃埔軍校，成為國民革命軍的搖籃。因此，一九二六——二七年便成為大革命的時代了。

在我們記憶上，無論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以及雲南起義，都只是統治階層的變動，和一般人民不發生關涉，大家的印象，總是很淡的。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國民革命，已經掀起了社會運動，和羣衆有了關連，那就振幅很廣大了；我們的印象，也就很深了。那年秋天，張作霖和他的奉軍到了北京，北京的文化人，都紛紛南下。那時郭沫若到廣州，做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工作。創造社的文人，也都在那兒帶筆從軍。語絲社和現代評論社的作家，也紛紛南下。魯迅、林語堂都到了廈門，傅斯年、顧頡剛到了廣州，後來，魯迅也到了廣州。現代評論社那些人，和國民政府發生關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語絲移到了上海，現代評論也停刊了。）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初，魯迅到了廣州。那時，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動已經很順利地展開了；廣州正是當時的革命策源地。他曾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革命與文學」，他說：「（1）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甚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在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牠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至於富有甚麼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2）到了大革命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

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他們之所謂文學了。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3）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又產生文學。這時候的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革，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到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之後會有的文學。有些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魯迅在這些方面，有他的遠見的，他是時代的先知。在當時，他說：「在中國還沒有這兩種文學，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然超然物外。」他對於當時的革命策源地十分失望，住了不久，也就回上海去了。

新文化運動，着眼社會問題的傾向，那是很明顯的，而且很積極的；其在新文學方面，不獨文

學研究會那一些作家，明白表示寫實主義的傾向。即創造社那些浪漫主義作家，他們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依然是在社會的桎梏下呻吟着的。他們都走向革命文學的路上了。（朱自清曾說：從新詩運動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舊詩裏原有敘述民間疾苦的詩，並有人像白居易，主張只有這種詩才是詩。可是新詩人的立場不同，不是從上層往下看，是與勞苦的人，站在一層而代他們說話，雖然只是理論上如此。）

我們也知道初期寫實主義的作品，大半是空洞的；誠如沈雁冰（茅盾）所說的：「現在熱心於新文學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們注意社會問題，同情於『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他們要把這種精神灌到創作中去。然而他們對於這些人的生活狀況素不熟悉；勉強描寫素不熟悉的人生，隨你手段怎樣高強，總是不對的，總要露出不真實的馬腳來。」葉紹鈞也說：「現在的創作家，人生觀在水平線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說有一個一致的普遍的傾向，就是對於黑暗勢力的反抗；最多見的是寫出家庭的慘狀、社會的悲劇和兵亂的災難，而表示反抗的意思。」革命的氣氛是很濃厚的，至於表現技術如何，那又是一個問題。

我們也看見創造社的作家，很快揭出革命文學的口號。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說：「青年，青年，你們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你們要把文藝的主潮認定，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去、革命的漩渦中去，你們要曉得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示同情無產階級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我們的要求，已經和世界的要求一致，他們昭告着我們，我們努力着向前猛進。」郁達夫也曾在創造月刊發刊詞中說：「我們志不在大，消極的就想以我們無力的同情，來安慰那些正直的慘敗的人生的戰士，積極的就想以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來促進改革這不合理的目的下的社會的組成。」

郭沫若曾經在一九二三年寫過以「上海的清晨」爲題的如次的詩：

「馬路上面的不是水門汀，

而是勞苦人們的血汗與生命；

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

在富兒們的汽車輪下，滾，滾，滾！

兄弟們喲，我相信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道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

這就是當時革命文學的作品。

當時，別的詩人，聞一多也寫了以「一句話」爲題的如次的詩：

「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

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

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

說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裏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 × ×

這話教我今天怎麼說？

你不信鐵樹開花也可，

那麼有一句話你聽着：

等火山忍不住緘默，

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

等到青天裏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這倒像是時代的預言了！

二 「學衡」與後「甲寅」

新文化運動的若干痕跡，頗似歐西的宗教革命；舊派與新派固相對立，新派與新派也多矛盾。一九二七年，魯迅往廣州，他寫給李小峯的信，曾說：「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但，他一直不會和郭沫若見面，而創造社對他的攻擊，倒反從那一時期開始了。而現代評論社、晨報社那一羣文人，和創造社的作家，也並不見怎樣和協。志摩日記曾有這麼一段珍貴的史料：

「秋白亦來，彼肺病已證實，而日夕勞作不能休，可憫。（瞿秋白那時是文學研究會的作家。）適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詩，陳義體格詞采皆見竭蹶，豈女神之遂永逝？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里一二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敝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顙，怡和可識。入門時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問，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室隘，陳設亦雜，小孩踰雜其間。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以濟枯窘，而主客間似有冰結，移時不換。沫若時含笑諦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啓端。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云上次有達夫時，其居亦稍整潔，談話亦較融洽。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這段日記，使我們了解新文人之間的情緒。

不過，一碰到新派與舊派的論爭，新派各集團的步調，又相當一致的。我們且把時期推移一段，且談「五四」落潮後的第二回文白大論戰；舊的方面，有學衡和後甲寅，新的則有語絲、現代評論、晨報、京報和上海的覺悟和學燈。那位對舊文學有興趣的農學家胡先驥，（筆者一直到抗戰中期，才在江西碰到胡先生，那時，他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也不時做些舊詩；舊詩做得並不高明。）他接中國文學改良論之後，又寫了一篇論新文學的論文，說：「胡適以過古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爲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比中國白話，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法、德，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文，恰如法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又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本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文乎？吾知其不然也！」又云：「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達意，文學則必於達意而外，有結構、有點綴、有修飾、有鍛鍊，非謂信筆所之，信口所說，便足稱文學也；今之言文學革命者，徒知趨於便寫，乃昧於此理矣。」

學術社另一主角梅光迪，也是胡適在美時期的論敵，他反對胡氏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新文學倡導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他說：「詭辯家之名，起於希臘季世。其時哲學盛興，思想自由。詭辯學崛起，以教授修詞，提倡新語爲業。詭辯家之旨，在以新異動人之說，迎阿少年，在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顧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吾國今日提倡新文化者，頗亦類是。」

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混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轉移，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這一派的復古議論，比林紓、嚴復說得圓通些，而且也並不牽涉到文學以外的倫常道德那些枝節上去。他們也支持了相當時期，牢守着他們的陣線，直到東南大學改組爲中央大學，由新潮社的主將羅家倫來任校長；學衡派猶堅守他們的看法，雖是他們的看法，不爲青年們所贊同。

一九二五年，那正是段祺瑞的執政時期；民初，那位邏輯文學家章士釗得位行其道，做了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忽然要從新辦起甲寅雜誌來，來反新文化，反文學革命，做起衛道的戰士來了。於是文白論戰，就從「後甲寅」導火了。照章氏的說法：「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後，髦士以俚語爲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士釗所爲風雨徬徨，求通其志，互數年而不得一當者也。」儼然是葉德輝、王先謙的口吻，比林琴南還鑽更深的牛角尖了。他批評新文化運動，說：「嗚乎！以鄙信妄爲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墮之狂，嚙載道行遠之業；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文歟？化歟？愚竊以爲欲進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甚矣，運動方式之誤，流毒乃若是乎！」他用擒賊先擒王的手法，對胡適之作正面的攻擊；說：「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爲今人之言者，即其善爲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適之日寢饋於古人之言，故其所爲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大抵有理致條段。今爲適之之學者，乃反乎是，以爲今

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牝嗎呢吧咧之文變。」

章氏掉文弄墨，頗沾沾自喜。胡適在武昌公開講演新文學運動，便說章氏之論，不值一駁；他揭穿了章氏所以由前甲寅變成後甲寅因由，說：「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他卻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裏會罵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其實行嚴自己卻真是夢想人人以秋桐爲大帝，以長沙爲上京，一味於甲寅雜誌中求文章義法。」這樣的牛角尖是鑽不通的（章氏也自己承認鑽牛角尖）。

和後甲寅對壘的新文人，不論語絲、現代評論或京報，陣容都是很齊整、很堅強的。而他們所碰的強敵，還不是胡適，而是比胡適更堅強的吳稚暉，一個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老頭子。他先後發表了「友喪」、「廣說輶」、「讀經救國」的諷刺文字，使章氏哭笑不得。他又在現代評論發表了「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和「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他說：「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來，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所以文人也者，即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蟲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鴟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他又從根本上針砭章氏，道：「國事也者，乃中華民國千秋萬歲之國事。中國若無共通優進的器藝，實現共通優進的道術，何以與

世界優進民族，共立於無疆。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更劇。中國一前一卻，徘徊觀望，若無其事。經不起再滑過了此後的廿五年，與世界共同程度，愈離愈遠；恐怕無論如何的換招牌，終究是一個劣等民族罷了！」頑固守舊的人物，從來沒碰到這樣一位有筆如刀的對手，章氏也只好退避三舍了！

這一回文白論爭，是有積極性的結論的。吳稚暉，他是和啓蒙時代那些有心人，如王照、勞乃宣一樣，一直在推動語文運動。他對於章士釗的批評，也發表了建設性的主張，說：「白話文言之爭，約有三點：一是好壞問題，二是作用問題，三是所生影響問題。先說好壞問題，豎了說，唐虞三代、漢魏六朝唐宋，典謨訓誥，至於詞曲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讀不厭的。所以拿古文白話分好壞，古文俗子固極好笑，白話小生也未必盡是。我們是鼓吹白話，不願意請他成文，至於要問『白話文』三字連舉，『本身通不通』，那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丟臉，他懂得文是什麼解的呢？第二說到作用問題，先說一句簡單的總結：我們不願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數人說話，又爲大多數人容易學習的文字，我們在作用上就認爲最適當。白話文便承乏此適當。白話文要出世，不要盛大的理由。物質的繁簡，同需要的廣狹，什麼都依着這種狀態而起變化，文字亦同是束縛在這個例內。若說你的字少，我的字多，白話當然多。多雖多，寫是容易，讀又容易，當今之世，印刷紙墨都不成問題，爲什麼要省幾個字，反花數倍的勞力呢？」他又說：「我在京報副刊上論到章先生個人，曾說：『他的謬說，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還在他讀那牢什子的鳥柳文。』那種鳥柳文遊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真是個人的倒楣！」

論爭之中，如高一涵的「新文化運動批評」，徐志摩的「守舊與玩舊」，郁達夫的「後甲寅十